

《泰泉集》题记三则^{*}

陈 广 恩

《泰泉集》是明代岭南大儒黄佐的诗文全集,文献中也称《黄泰泉先生全集》^①、《黄文裕公泰泉先生文集》^②、《泰泉全书》^③、《泰泉全集》^④、《黄泰泉集》^⑤等。黄佐(1490-1566),字才伯,别号希斋,又号太霞子,晚号泰泉居士,广东香山(今广东中山市)人。正德庚辰(1520)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出为江西提学僉事,不久改督广西学校,因母病弃官归养,居家九年。嘉靖十五年(1536),黄佐再次被朝廷起用,授翰林编修、左春坊左司谏。其后升翰林侍读,掌南京翰林院事。旋升右谕德,兼修撰,再迁南京国子祭酒。丁母忧,服阙,起为詹事府少詹事,仕宦至顶峰。黄佐一生在朝为官时间不是很久,“通籍三十年,在朝仅数载”^⑥,但因为人耿直,卷入“大礼议”之争,又开罪于大学士夏言等人,遂受排挤,绝意宦场。致仕后黄佐返粤讲学、著述,孜孜于学术与文化教育事业。黄佐卒后,赠礼部右侍郎,谥文裕。

黄佐学以博约为宗旨,于典礼、乐律、词章无不该通,著有《泰泉集》等著

^{*} 本文系全国高校古委会项目“《泰泉集》点校”(0824)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暨南大学图书馆所藏《泰泉集》,首页即题为“黄泰泉先生全集”。该本为黄佐后人清代黄遼卿重刻本。首页钤“翰苑流芳”朱印。

② 黄佐弟子、明代南海学者陈绍儒为《泰泉集》所撰序文,称书名为《黄文裕公泰泉先生文集》。见屈大均辑,陈广恩点校:《广东文选》卷九《黄文裕公泰泉先生文集序》,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85页。

③ 田明曜修,陈澧纂:《光绪香山县志》卷二一《艺文》,《续修四库全书》第713册《史部·地理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80页。

④ 阮元修,陈昌齐、刘彬华等纂:《道光广东通志》卷一九五《艺文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第3566页。

⑤ 王圻纂辑:《续文献通考》卷一八二《经籍考》,《续修四库全书》第765册《史部·政书类》,第486页。

⑥ 黎民表:《泰泉先生黄公行状》,载黄佐《泰泉集》卷首,明万历元年刻本。

作 35 种,700 多卷,“数千万言”^①,被学者尊为泰泉先生,与丘濬、陈献章合称为明代广东三大学者^②。明清以来,历代学者对黄佐的赞誉可谓史不绝书。明人顾起纶称他“性尚冲和,韵含芳润,玄览鳌洲,藏珍琼海,为一代名家”^③。黄佐的八世孙、清代“粤东三子”之一的黄培芳,称赞黄佐为“前明一代理学名儒”^④。四库馆臣称赞黄佐“明习掌故,博综今古……在明人之中,学问最有根柢”^⑤。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亦为他专立《泰泉学案》。林子雄先生在所著《黄佐》一书中,称黄佐为“明朝岭南的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⑥,这个评价应该是名副其实的。笔者以为,称其为史学家,亦不为过。于上述诸家之誉,可见黄佐在明代岭南文化史、思想史上之地位。

在黄佐 35 种著作之中,对于研究黄佐本人而言,《泰泉集》应该是最重要的一部。目前可知,《泰泉集》的版本情况比较复杂,有 1 卷本、10 卷本、60 卷本三种本子行世,且各卷本又有不同的刻本^⑦。三种本子中,1 卷本、10 卷本主要是黄佐的诗集。《四库全书》所收《泰泉集》,即是 10 卷本诗集。60 卷本《泰泉集》为足帙,包括赋、骚辞、乐章、琴操、乐府、诗、对策、符命、颂、叙录、箴、赞、铭、诵、谣、祝辞、字辞、奏疏、书、启、问对、设论、策问、论、议、说、原、解、辩、考、述、禁谕、记、序、题跋、图经、碑、神道碑、墓表、墓志、诔、传、行状、祭文诸体,全书约 65 万字。在明人别集尤其是明代岭南文献史上,《泰泉集》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但因为该书流传不广,目前尚无 60 卷本影印本问世,这就使该书的阅读、利用受到很大限制,所以至今《泰泉集》尚未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和足够重视。迄今为止,亦未见有研究《泰泉集》的专文发表。

笔者在整理《泰泉集》的过程中,发现国内外收藏的《泰泉集》刻本中有三则题记,这些题记对了解《泰泉集》的编纂、刊刻、收藏、流传之历史,以及《泰泉集》作者黄佐的相关情况和《泰泉集》的内容、体裁等,均有相应的学术意义和价值。笔者拟就三则题记进行初步分析,探讨其文献价值,以期有助于学界对《泰泉集》的了解和进一步研究。

①黄培芳等纂修:《黄氏家乘》卷首《重修族谱旧序》,《北京图书馆藏家谱丛刊·闽粤侨乡卷》,第五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 年影印本,第 29 页。

②温汝能纂辑,吕永光等整理,李曲斋、陈永正审定:《粤东诗海》(上),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358 页。

③顾起纶:《国雅品·士品四》,载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 年,第 1108 页。

④黄培芳:《香石诗话》卷二,嘉庆十五年岭海楼刻嘉庆十六年重校本。

⑤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二《集部·别集类二五》,中华书局,1965 年,第 1503 页。

⑥林子雄:《黄佐》“引子”,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 1 页。

⑦关于《泰泉集》版本具体情况,请参阅拙文《泰泉集版本初探》,《暨南学报》2014 年第 2 期。

一、湖南图书馆藏明万历元年 60 卷刻本,卷首附叶启勋题记

湖南省图书馆所藏《泰泉集》,共 60 卷,为明万历元年刻本。该刻本卷首有隆庆二年、三年、五年追赠黄佐的制诰,其次是目录,张璧的序文,黎民表所撰《泰泉先生黄公行状》。此本国家图书馆藏有胶卷,共 3 卷。该本卷首之前,有叶启勋题记,胶卷于书名后注有如下数字:“黄佐撰,黄在中等辑。民国叶启勋题识。二十四册。”可知万历本《泰泉集》是黄佐之子黄在中等人辑录的,该本《泰泉集》原书共 24 册,有叶启勋的题记:

希斋官南京国子监祭酒时,曾手自编定其诗,为十卷。嘉靖廿一年,其门人李时行刊版于嘉兴。后其子在中、在素、在宏汇辑遗稿,合而编之,刻于万历元年,此本是也。首有嘉靖廿一年张璧及万历七年陈绍儒二序,每半页十行,每行廿字。

希斋诗体颇正而取材太陈,格虽耸高而气少奔逸,文则章疏切实,体裁雅洁,颇多有道之言。盖其博极群书,笃守洙泗之学,而不以聚徒讲学名,故所论述皆有根柢^①。黎民表称其操履端谨,模范严整,居无惰容,燕无媿语,宜其立言不苟,类其为人。正、嘉之际,学问渐岐,而希斋独恪守先儒,不为高论,可谓笃实之士矣。《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李时行刊本,有诗无文。《提要》所载希斋《春夜大醉言志》诗,此本亦有之,而无自注,则馆臣所谓“是将以嘲风弄月之词,而牵合于理学”者,殆不然乎!

史称希斋弟子多以行业自饬,而梁有誉、欧大任、黎民表诗名最著。是集前有黎民表《行状》,后有大任后序,或者注为其所删欤?朱彝尊《静志居诗话》称,岭表自南园五先生后,风雅中坠,文裕力为起衰,如黎维敬、梁公实辈,皆其弟子。嘉靖中南园后五先生,二子与焉。盖岭南诗派,文裕实为领袖,不^②可泯也。然则希斋可传者,又不囿在区区词采间矣。

丙子二月晦日,定侯叶启勋记。

题记共两页,第一页十一行,第二页九行,满行二十二字。两页共计四百二十四字。题记乃叶启勋手书,楷书工整俊逸,结构严谨,字体清健遒劲,笔起锋回,顿点有力,笔力挺拔,颇具书法艺术和审美价值。于此题记,亦可见叶启勋书法之造诣。

叶启勋(1900-1972),近代著名的藏书家和文献学家,字定侯、更生,号拾经主人、南阳穀人、玉涧后人、穀道后人等,湖南长沙人,是清代湖南著名学者叶德辉三弟叶德炯之次子。叶启勋的藏书室名为拾经楼,藏书达十万多卷。这则题记作于丙子年,即 1936 年。题记首页首行前的空白处钤印“南阳”,下方

①据《四库全书总目》,此处“柢”当为“抵”之笔误。

②“不”前原衍“可”字,据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十一删。朱彝尊著,姚祖恩、黄君坦校点:《静志居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年,第 297 页。

铃有“拾经楼”印,末尾于“叶启勋记”下,铃印“更生”。此外该本《泰泉集》序文首页铃“拾经主人”、“定侯审定”印,卷一首页铃“中吴叶启蕃启勋启发兄弟珍藏书籍”、“叶启勋”、“定侯所藏”、“叶氏启发”、“东明鉴藏”等印,书末于欧大任跋文之后,又铃“叶氏启勋读过”、“叶启发藏书记”两印。这些印章均是叶启勋、叶启发(字东明)兄弟的藏书印。

叶启勋的题记,首先交待了《泰泉集》的编纂及刊刻情况。黄佐在任南京国子监祭酒时,曾亲自编定其诗歌,共10卷。其后黄佐门人李时行任职嘉兴时,刊刻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这就是前文提到的10卷本,也是《泰泉集》最早的刻本,《四库全书》所收《泰泉集》,依据的正是此本。黄佐死后,其子黄在中、黄在素、黄在宏兄弟将其父遗稿汇集起来,编成诗文全集,刊刻于万历年年(1573)。叶启勋收藏的《泰泉集》,正是万历元年刻本。据题记,该本前有嘉靖廿一年张璧及万历七年陈绍儒的两篇序文,序文每半页十行,每行廿字。但从国图所藏胶卷来看,该本已不存陈绍儒序文,可能是其后陈绍儒序文在流通过程中散佚了^①。现存此本已有破损、残缺,很多地方版面模糊,字迹不清,有些版面字迹甚至无法辨认,所以国图将其归为普通古籍。

题记中叶启勋对黄佐的诗文成就亦做了一番评论。叶启勋对黄佐诗歌的评价,其实是借鉴了清初学者朱彝尊的观点。朱彝尊认为“文裕撰体颇正,而取材太陈,故格虽耸高,而气少奔逸”。^②相对于诗歌而言,叶启勋认为黄佐的文章“则章疏切实,体裁雅洁,颇多有道之言”。究其原因,是黄佐博极群书,笃守洙泗之学的结果。的确,黄佐在学术思想上是恪守孔孟儒学,坚持孔子所谓“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在黄佐看来,“博之为言广也,而有大通之义;约之为言要也,而有检束之义。自学者而言,所贵乎知要也,守约足矣;自教者而言,则人之有生也,精神有限而情欲无穷,闻见有限而理义无穷,必使之学为圣人焉。”^③“博文则知而精,约礼则仁而一”,博约的目的,就是要学作圣人,就像颜渊那样“庶几乎亚于仲尼,能入尧舜之道”^④。“正德、嘉靖间而古风渐渺”,诗风、文风亦处于转型之期。“在茶陵宗派消歇之余,七子议论方兴之会”,黄佐“独能力追正始,不失雅音,犹为不惑于歧趋者焉”。^⑤黄佐的这种坚持,即源于他对儒家传统的固守。在社会变革之际,他能以博约律己,恪守孔孟之道,不为高论,所以叶启勋称其为“笃实之士”。

叶启勋在题记中还就前人对黄佐《春夜大醉言志》一诗的解读,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这也牵扯到这首诗黄佐是否有自注的问题。《泰泉集》卷十二

①南图和苏州图书馆收藏的60卷本《泰泉集》,均有陈绍儒序文。

②《静志居诗话》卷十一,第297页。

③《泰泉集》卷二九《博约解》。

④《泰泉集》卷二九《博约解》。

⑤《泰泉集·提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所录《春夜大醉言志》云：

拔剑起舞临高台，北斗插地银河回。
长空赠我以明月，天下知心惟酒杯。
门前马跃箫鼓动，栅上鸡啼天地开。
倦游却忆少年事，笑拥如花歌《落梅》。

嘉靖二十一年刻本及《四库全书》本《泰泉集》，于诗末均有黄佐双行小字的自注：“欲尽理还之喻。”盖《四库全书》本沿袭了嘉靖刻本。明人王世贞由此说：“盖此公作美官讲学，恐人得而持之也。可发词林一笑。”^①其后钱谦益、朱彝尊等名家亦承袭王说，四库馆臣亦持批评态度：“是将以嘲风弄月之词，而牵合于理学，殊为无谓。”^②但查万历元年刻本，诗末并无黄佐自注，因此叶启勋认为四库馆臣之说，“殆不然乎”。再查清初重刻本，如北京大学藏本^③等，亦不见黄佐自注，则“欲尽理还之喻”是否黄佐自注，尚不能定论，抑或为李时行在嘉兴刊刻之时所加，黄佐诸子万历元年汇刻时又删去，亦未可知。

题记提到该本首尾有黄佐弟子黎民表所撰行状和欧大任为《泰泉集》所作后序。黎民表所撰《泰泉先生黄公行状》^④，全文近6000字，对黄佐的一生做了比较全面的叙述和评论，是研究黄佐的非常重要的资料。在叶启勋看来，黄佐一生的作为，又不仅仅在区区词采之间，正如朱彝尊所言，他对岭南诗风、文风的改变，岭南人才的培养，文献著述的编著，乃至明中期理学思想的发展演变等，均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南京图书馆藏明万历元年60卷刻本，扉页背面粘丁丙题记

南京图书馆藏本亦为万历元年60卷刻本，书内往往于各卷首页钤“江苏第一图书馆善本书之印记”。该本首页前有手书题记，写在一张条状宣纸上，贴在首页背面。题记首行以大字题写书名及卷数：“黄文裕公泰泉先生文集六十卷”，书名之下右侧题“明万历刊本”。可知此本与叶启勋藏本为同一刻本。题记内容如下：

明黄佐撰。佐字才伯，泰泉，其号也。登正德庚辰进士第。历官翰林官

①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一五〇《说部》，明万历刻本。

②永瑆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二《集部·别集类二五》，第1503页。

③北京大学图书馆和浙江省图书馆的网站上，均注明各自所藏《泰泉集》（60卷本）是明万历元年刻本。但经笔者查对，实际上两个图书馆的藏本，和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图书馆，以及广东省中山图书馆的藏本一样，均是清初重刻本。两馆藏本因残缺，版本均无明确刊刻时间信息，因故致误。万历元年刻本和清初重刻本一个明显的不同，是前者白口，无鱼尾，四周单边，后者白口，单鱼尾，四周双边。另外重刻本每卷卷末所注书名和卷数后，比万历本多了一个“终”字。

④以苏州图书馆所藏万历元年刻本《泰泉集》和叶启勋藏本比对，可以看出黎民表的《行状》，两个藏本的字体不一，前者是楷体，后者为宋体。

詹、侍读学士,卒赠礼部右侍郎,谥文裕。此集前载隆庆五年制诰,又嘉靖二十一年南京礼部尚书南郡张璧及万历七年南京工部尚书南海后学陈绍儒二序,后载门人欧大任跋。盖文裕嗣子在中、在素、在宏编刊也。卷一至三:赋;卷四:骚辞、乐章、琴操、乐府;卷五:四言古诗;卷六、七:五言古诗;卷八:五^①言古诗、七言古诗;卷九:七言古诗及七言长短句;卷十:五言律诗;卷十一:五言律诗、排律;卷十二:七言律诗;卷十三:七言律诗、七排、五六言绝句;第十四:七言绝句、联句、集古诗;卷十五:对策;卷十六:符命、颂、叙录;卷十七:箴上;卷十八:箴下、赞、铭、诵、谣、祝辞、字辞;第十九、二十:奏疏;卷二十一、二:书、启;卷二十三:问对、设论;卷二十四:策问;卷二十五、六、七:论、议;卷二十八:说;卷二十九:原、解、辩、考、述、禁谕;卷三十之三十三:记;卷三十四之四十三:序;卷四十四:题跋;卷四十五、六:图经;卷四十七:碑;卷四十八:神道碑;卷四十九之五十一:墓表;卷五十二之五十五:墓表^②、谏;卷五十六、七:传;卷五十八:行状;卷五十九、六十:祭文。文裕著书二十二种,多至二百六十餘卷,宜乎别集之富也。

这篇题记亦见于丁丙所辑《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三七《集部》十六,清光绪刻本),则题记应当是丁丙所书。原书第二页右侧中下部钤印“八千卷楼珍藏善本”,印文为行楷,双行竖刻,单行四字,“珍”字已残左角,但字迹仍可辨认。

丁丙的题记首先介绍了黄佐的字号及仕宦,然后交待文集包含的具体内容,包括卷首制诰,张璧和陈绍儒的序文^③,欧大任的跋文,以及具体各卷的体裁,从而使读者对《泰泉集》的版本、作者、内容、体裁等有了总体认识^④。最后丁丙指出黄佐的著作有22种,260餘卷。丁丙关于黄佐著作的数量和卷数,当来自陈绍儒的序文和《明史》的记载。黄佐弟子陈绍儒应黄佐之子黄在素的邀请,于万历七年(1579)为《泰泉集》作序,也就是前文提到的《泰泉集》卷首的序文之一,题名“黄文裕公泰泉先生文集序”。序文中陈绍儒说黄佐“所著书二十二种,传之艺苑”^⑤。《明史》载黄佐“平生撰述至二百六十餘卷”^⑥。但陈绍儒和《明史》的记载,其实均不准确。黄培芳即指出,黄佐“著述之富,至三十

①题记写作“古”,当是笔误。据《泰泉集》目录改。

②据《泰泉集》目录,此处墓表当为墓志之误。

③南图藏本和苏州图书馆藏本,序文顺序并不一致。南图藏本书前是隆庆五年的制诰,然后是张璧、陈绍儒的序文,其后目录。苏州图书馆藏本书前无制诰,陈绍儒的序文在张璧序文之前,与南图顺序正好相反,其后目录。

④南图藏本卷首无黎民表所撰黄佐行状,因故丁丙的题记中也没有交待,这是南图藏本和湖南、苏州藏本的一个明显不同。

⑤《泰泉集》卷首,康熙二十一年重刻本;《广东文选》,第386页。

⑥《明史》卷二八七《文苑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7366页。

种,邱琼山亦不能及”^①。笔者依据黎民表为黄佐所撰行状,欧大任的后序,以及《黄氏家乘》的记载^②,统计黄佐的著作(包括其审订的著作)有35种(去除重复者),700多卷。这个数据,尤其是卷数,远远超过了前人的记载。

三、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明万历元年60卷刻本题记

日本宫内厅书陵部亦收藏有万历元年刻本《泰泉集》60卷。日本中文古籍数据库于宫内厅藏本下有题记曰:

佐集以此本为最足之帙。前有嘉靖二十一年张璧序,后有万历癸酉欧大任跋。文政中,毛利出云守高翰所献幕府。首有“佐伯侯毛利高标字培松藏书画之印”印,每册首捺“张元焕印”、“秘阁图书之章”两印记。

文政是日本国年号(1818-1829),时处江户时代(1608-1868),当时日本由德川幕府统治。幕府统治下的佐伯藩位于九州岛丰后(今大分县),毛利高标(1755-1801),字培松,是佐伯藩的第八代藩主。此人以博雅著称,藏书多达八万馀卷,几乎全是从中国直接舶载而来,故多珍品。其藏书机构名为佐伯文库,藏书往往钤“佐伯侯毛利高标字培松藏书画之印”。此本为毛利高标所收藏,说明《泰泉集》万历元年刻本,最迟在18世纪后期,已流传到日本。1828年,毛利高标之孙出云守毛利高翰(1795-1852,佐伯藩第十代藩主),将其家族所藏图书一万七千馀种进献给幕府,这其中应包括此本《泰泉集》。“秘阁图书之章”的钤印,正说明该本其后由德川幕府收藏。日本德川幕府的藏书机构名叫枫山文库,始建于日本庆长七年(1602)。至宽永十六年(1639),德川幕府的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将藏书机构迁至枫山,因名“枫山文库”。因其藏书多为珍本,亦称“枫山秘阁”,这就是德川幕府藏书钤“秘阁图书之章”印的由来。枫山文库的藏书于明治十七年(1884)移交给日本政府的太政官文库,即今内阁文库。明治二十四年(1891),又将其中的珍本移交宫内省图书寮(1949年更名为宫内厅书陵部)^③。以上即是题记告诉我们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泰泉集》万历刻本的辗转收藏情况。每册首钤“张元焕印”,则张元焕理应是藏书主人之一,但此人的具体情况,尚未查到相关线索。

宫内厅书陵部藏本卷首没有陈绍儒的序文和黎民表的《泰泉先生黄公行状》,也没有制诰,只有张璧的序文,后有欧大任作于万历癸酉(1573)的跋文。并且张璧序文第二页两面,装订时误入第三卷末尾。另外卷三十第一、二两页,误订入卷五十第一、二两页。该本亦有缺页,如卷四三,缺二一、二二两页,卷五

①《香石诗话》卷二。

②《黄氏家乘》卷六《艺文·文裕公书目》,《北京图书馆藏家谱丛刊·闽粤侨乡卷》,第五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第679-755页。

③《〈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影印丛书〉影印说明》(第一辑),《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第1期。

十缺首二页,亦有部分页面有残缺。日藏本比湖南省图书馆藏本版面干净、整洁得多,可称善本。

附记:感谢日本明治大学樱井智美博士对笔者提供的不厌其烦的热情帮助。在樱井博士的相助之下,宫内厅书陵部慷慨提供《泰泉集》藏本的复印件给本文作者,在此一并致谢。感谢国图杨印民先生,中山大学易素梅先生,暨南大学陈志平、屈文军先生在笔者搜集资料及辨认铃印过程中提供的热情帮助。

作者工作单位: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

《杜甫全集校注》出版

由已故著名杜甫研究专家萧涤非先生领衔主编,张忠纲先生担任全书终审统稿,历经三十六年打磨的《杜甫全集校注》,2014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首先,该书校勘精密,辨伪审慎。它以明末毛晋抄补《宋本杜工部集》为底本,校以十三种宋元刻本和一种明抄本,又以宋刊《太平御览》、《文苑英华》、《乐府诗集》等类书、总集参校,充分利用了宋代留存的文献,可以说是在宋人的基础上努力还原杜甫作品的本来面目。其次,体例完备,内容丰富。该书在体例上集合旧例,创设新目:题解、注释、集评、备考、校记、附录,尤其是集评、备考两项,集历代评议,备诸相左观点,纲举目张,几乎全面网罗了千年来人们有关杜甫作品的各种意见,解决了古来杜注中各种未能妥善处理的诸多问题,基本上达到了得失自现的程度。再次,别择精审,考按合理。宋人谓杜诗“无一字无来处”,历代注家大多广征远引,务求博雅,有的甚至伪造笺注,如“伪王注”、“伪苏注”,有的则附会史实,务为穿凿。该书参阅杜集评注本一百三十余种,删削别裁,条次分明。注释部分,力求“词语明而诗义彰”,于纷纭众说,则去芜存菁,然后以按语揭明己见,其存疑存异的内容则附入“集评”、“备考”。最后,该书考订坚确,论述平实。校注者们在全面汲取旧注的基础上,充分吸收了新的研究成果,纠正旧注之讹,提升笺注水平。如辨别“伪苏注”与苏轼实有论述;又如旧注以《所思(得台州郑司户虔消息)》作于上元二年,据今新发现的诗人故友郑虔《墓志铭》改定为乾元二年秋;又如杜甫最后漂泊湖南的诗,旧注将《入乔口》、《铜官渚守风》、《双枫浦》、《发潭州》等置于《宿花石戍》、《次晚洲》诸诗之后,其实是前后颠倒了,《校注》者根据实地踏勘的成果做了调整,澄清了千百年的沿袭之误。